

汪丁 著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

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

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孔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
选择 / 汪丁丁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470-8

I. ①新… II. ①汪… III. ①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2445 号

责任编辑 李 岷
装帧设计 肖晋兴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汪丁丁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39.5
插 页 2
字 数 599, 000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470-8/F·2175
定 价 99.80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讲 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 一、政治社会学三维理解框架 9
-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14
- 三、核心议题：正义 29
- 附录 逝者：艾智仁 39

第二讲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想与艾智仁和休谟的产权学说

- 一、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想 45
-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前五种 57
- 三、艾智仁：UCLA视角下的经济学定义 67
- 四、休谟的产权学说 84
- 附录一 论政治家的品格 106
- 附录二 民主的条件 108

第三讲 正义理论“两条路线”的纠缠

- 一、两条道路：诉诸情感与诉诸理性 115
- 二、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 133
- 三、功利主义的核心困境 140
- 附录 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 170

第四讲 正义：观念与社会实践

- 一、“社会正义”观念史 175

目录

二、正义观念的社会实践	187
三、中国的正义实践	197
四、斯蒂格勒：奈特的阐释者	216
五、奈特：“科学、哲学与社会过程”（一）	227

第五讲 从奈特到布坎南

一、奈特：“科学、哲学与社会过程”（二）	253
二、布坎南品味	283
附录一 关于“常识”的思想史考察	307
附录二 逝者：赫希曼	336

第六讲 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社会正义

一、公共理性	343
二、政治民主与社会正义	395
附录一 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研究报告及相关评论	411
附录二 关于政治民主的实证研究	434

第七讲 实践智慧

一、政治经济学的三种语言风格	441
二、哈贝马斯：恢复实践智慧	445
三、余英时：绝地天通与天人合一	478
四、梁漱溟：静心求仁	490
五、克里希那穆提：神与努斯分离	502
附录 语言、符号、族群与文化	514

第八讲 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一、文化与道统	537
二、制度：探求“合理稳态”的转型期中国	558
三、中国人的幸福三维空间	579
附录 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617

序 言

新政治经济学的序论很长，占用了这本讲义第一讲和第二讲的几乎全部篇幅。因为，这门课程可以有六种不同的开端和定义，各有独特的和值得关注的方面。所以，2012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导论性地讲解了全部六种不同开端，然后从第六种开端进入课程。根据第六种开端，新政治经济学 = 效率原则 + 正义原则，或者说，这是一门关于冲突及其协调的社会科学。

从第六种开端进入课程的另一优势是使学生们迅速理解新古典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强烈互补关系。在公共政策研究基础的视角下，寻找和实施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在社会成员的兴趣或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境里寻求符合某种正义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协调机制，这是新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或者说，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可分为帕累托改善的合作机会和存在冲突的合作机会。经验表明，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的潜在合作机会的集合，是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的一个非常小的子集。所以，如果我们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公共政策建议，我们的人均收入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发展将异常缓慢甚至完全停滞。事实上，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小概率致命冲击）。这一命题意味着两件事情：其一，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耗尽之后，人们必须有面对冲突的勇气和化解冲突的智慧，否则就陷入停滞，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其二，帕累托改善本质上是静止的概念，而冲突和冲突的化解本质上是动态的概念——此处的“动态”不是物理时间的而是历史时间的动态。所谓“历史时间”，就是不可逆转的时间，或具

有强烈“路径依赖性”的人类发展过程。为什么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不是普通的不确定性，而是“小概率致命冲击”。所谓“致命冲击”（vital impact），就意味着社会演化（人类发展过程）被这样的冲击推出既有的往往是停滞的路径。也因此，历史成为不可逆转的。

人类不可能也从未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帕累托改善”机会的贫瘠性，人类社会总是充满了冲突，并且总是努力化解冲突，以免被冲突彻底瓦解。在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里，新政治经济学家致力于新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帕累托改善子集之外的无限广阔领域里的人类合作研究。当代人类合作的秩序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展，得益于这两类经济学家的的工作。

在每一个冲突情境里，经验表明，冲突各方对正义的关注超过对效率的关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或囚徒困境的“不合作策略”，虽不符合效率原则，却总是符合某种正义原则。关键在于，何为“正义”？这是第三讲的主题。人类社会必须有某些正义原则来为既有的不平等提供辩解（秩序之合法性的论证），从而使社会免于被冲突彻底瓦解。以轮流执政的方式，这些正义原则可以排列在普遍主义态度和特殊主义态度这两极端之间，适应不同的情境。由于历史的不可逆转性，这些情境不可能被简化为同一模型（仅适用于物理时间的动态过程）。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家必须考察各种不同类型的情境，并时刻警惕人类理性自负地试图为这些情境建构统一体系的危险。就这一方法论而言，新政治经济学确实在向休谟和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正义的观念，假以时日，足可影响社会演化的路径。经验表明，在大约两代人的时间里，武器的批判可以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因此，我用第四讲和第五讲的大部分篇幅，考察正义观念的实践，同时讲解奈特和布坎南的“社会过程”原理。这一基本原理在第六讲有更充分的展开，从而将课程引入“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探讨（第七讲和第八讲）。

与我以往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相当不同，2012年秋季学期的新政治经济学课程，从效率问题进入到正义问题，再进入到“实践智慧”和中国社会未来最必要的发展方向的讨论。尤其是最后两讲，涉及几乎全部知识领域，不得不增加若干“附录”以补充我的叙述。也是因为我的叙述过于庞杂，新的教学手段成为这一课程最重要的学习工具，这就是“心智

地图”。这种专用于 iPad（对系统配置要求极高）的软件，可绘制规模极大的心智地图，不难容纳全部课程的核心观念和思想脉络。于是，几乎每一讲都附有一张融贯全部课程的心智地图。随着课程的展开，心智地图的复杂程度也迅速增加，以致在第六讲之后，我不得不用另一套软件为最后两讲制作另一套心智地图。有了这些地图，读者就可随时从我的叙述返回到心智地图，并且很容易看到每一专题在心智地图里的位置——与其他专题之间和与“新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无疑，要出版这样的讲义，绝非易事。

长期以来，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我不相信任何组织（当然包括政府和企业），我只相信朋友。出书，我不在乎出版社或企业的名声，我只问是否有可信的朋友负责出版我的书。例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是我 1990 年代初期在香港结识的朋友，二十多年来，我和他见面不多，但预期不变——他是那种让人能够保持预期不变的朋友。于是，我的学术著作，几乎没有例外，交由陈昕出版。以友谊为基础，我和世纪文景的朋友们能够相互包容——我推测，他们包容我更多。

写书，与出书相比，当然更不容易。我写书速度很快，平均每天五千字。写过博士论文的人都明白，某一日可写一万字，未必每日可写一万字。思路顺畅的时候，一天可轻易写一万字；思路阻滞的时候，整日苦思而不得动笔。故而，百日平均每日五千字，算是高速写作。高速写作的代价是生活很贵，或许是我家“小李”能支付的最贵的那种生活（大约七倍于书的版税收入）。我的朋友都知道小李对我意义重大，他们也常以此嘲笑我。写这部讲义，我们用了四个月时间。第一个月和第四个月，小李带着我住东京一家考究而低调的酒店式公寓。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小李带着我住夏威夷海边一家与东京中城奥克伍德元首饭店有类似格调的酒店式公寓。小李选择酒店式公寓，首先要考察卫生水平——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酒店管理集团的品牌，其次考察公寓内部的厨房设施和厨具餐具的完备程度——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公寓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再次考察公寓附近超市或商场的食材之新鲜程度与各种佐料之完备程度——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公寓所在的商业区的成熟程度（不可太新，也不可太老）。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的写作生活，所谓“贵”者，其实就是接近自然状态而已。这是现代人的不幸，尤其是现代中国人的不幸。试问在北京工作的朋友，为日常生活里接近自然

状态的水、空气、食品、衣物等等，愿意支付并且已经支付了怎样的价格？所以，我和小李在闲暇时间常仔细核对我们在北京、东京、檀香山的生活费用。经验表明，为了接近自然状态的水、空气、食品、衣物等等，我们两人每月平均的生活费用（不考虑居住的成本），北京是最贵的，其次是东京，再次是檀香山最繁华的海滩。我承认，除了食品安全代价极高之外，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也是使北京成为最贵城市的一项重要因素。不论如何，我的意思是，在东京和檀香山写这本书，比在北京成本更低。

如果不给我提供上述的生活条件，我写书的速度就要降低至零，也就是说，我无法写书，当然，要写一些杂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是批判社会，不如此就一定要感觉可耻。蔡澜谈吃，不批判社会；我谈吃，常要有所批判。蔡澜探讨生活品质，讲究的是生活本身的细节；我探讨生活品质，首先追究社会原因。例如，我认为，精致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两大因素：（1）是否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2）是否有敬业的生产者群体。中国教育失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同时缺少这两种群体。可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确实达到了对精致生活有所需求或有很大需求的阶段。在企业家看来，这就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北京也确实出现了几家专业递送各类“令人放心”食品的企业。能生存多久？是一个问题。没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足够大从而能支持这类企业），“猪食”和“美食”无差异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美食传统？更何况，造假成习俗，我们也缺少敬业的生产者。精致的生活用品，信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很强的不对称性。不敬业或造假成为产业惯例之后，精致的消费者要么退化为粗糙的消费者，要么加入国外的精致消费群体。退化，代价是生命，很贵。加入国外的消费群体，代价当然比国外的消费者更高。我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精致生活在北京是最贵的，以致成为不可能的。

敬业的精神，北京当然最差，其次是夏威夷，最好的在东京。我们入住的公寓，小李每天检查卫生，用手指轻擦最不引人注意并且最难触及的设备或房间的角落，然后对着光查看手指，一尘不染，就算通过。东京的通过率是90%以上，夏威夷的不到30%。国内的酒店，虽然都是五星级，却没有一家哪怕一次能通过小李的卫生检查。在经济学家看来，敬业要求有高工资激励。国内的传统服务业工资，与农民工相差无几，谈不上敬业精神。某日我

在杭州与一位美术史家闲谈，听他讲“全国的房子都是农民工造的，所以全国的建筑无精致可言”，深以为然。那么，夏威夷的酒店业和东京的酒店业，雇员工资相差不多，为何敬业程度相差很大？可见，工资激励和消费者的精致程度应联合在一起，才可解释上述现象。

我上述这套理论是用来解释生活品质的，而生活无所不包，所以这套理论的应用范围应是最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外粗俗，我很难想像生活品质怎么可能精致起来。人与人之间精致的关系或关系不断精致的过程，埃利亚斯说，这叫作“文明化进程”。MIT的神经语言学家平克教授，最近写书论证人类社会的长期趋势是暴力越来越少，当然是文明化进程的后果，人脑内的“暴力”神经网络正在日益蜕变为“文明”神经网络；虽然，据说我们中国正经历的是“野蛮化”过程。结合我的那一套理论，文明化进程有两大前提：其一是有足够多的人对精致关系有所需求，其二是有足够多的人认真对待精致关系。所谓“足够多”，根据“三分之一定律”（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至少要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果不够多呢？例如，野蛮化的人数超过了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么，社会就变得越来越野蛮化。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已特别野蛮化了，试问，哪一个野蛮社会有我们现在这样骇人听闻的日常生活危机？

问题在于，我们有各种意义的精致——坑蒙拐骗偷的手段更加高明，金钱与权力勾结的方式更加巧妙，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虚伪。我多次想像着试图定义“精致生活”，最近一次是这样想像的：精致的生活，必须在特定社会的特定个体的幸福三维空间里，才有确定的意义。什么是“幸福三维空间”？这是第一讲开篇我引入的长期以来适用于任何观念、任何理论、任何现象的理解框架，此处不赘。正义，根据海勒女士的见解，就是追求幸福的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中国的骗子受审时，旁观者常指出中国的官员是超级骗子为何不受审，于是凸显正义诉求之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某甲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是追问使某甲沦为流氓的社会原因。在“社会档案”里，神记录着人的一切罪孽。在无神的社会里，我同意海勒女士的见解，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

其实，我这部讲义，不仅是“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而且是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

更美好的讲义。也因此，这部讲义是我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长期探讨的最近一次总结。感谢 2004 年以来参与北京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助教和研究生，尽管这部讲义并非“十年磨一剑”——因为我的这一课程每年有不同的主题。感谢这部讲义的编辑李頔，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两位老朋友施宏俊和姚映然，他们多年以来无条件地支持我和助教们将课堂录音编写为讲义。

写至第六讲结尾时，清晨，一只雪白的鸽子好奇地站在阳台扶栏上，眼睛很好看，像小白兔的眼睛。这双美丽的眼睛，视线从我移动到我膝盖上的 MacBook Air，看出来了，我在海边写我这本书呢，然后，白鸽转身望着暗蓝色的海，飞走了。小天使，我自言自语。我感谢我和妻子的小天使，我们的女儿，此刻，她在加州海边某一咖啡馆的沙发里苦苦写着她的博士论文。白鸽的另一寓意，我在大连主持一系列研讨会的时候恍然觉得，是我们实验班里的这些学生，他们陪伴着我。自由，是整体之事，我们一起成长。我们的“成长”，定义是：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

2013 年 3 月 25 日

Suite 703, Oakwood Premier Tokyo Midtown

（我要对这家酒店的管理和服务团队表示特别感谢。）

第一讲

2012年9月16日 / 下午3:00—6:00 / 理教409

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一、政治社会学三维理解框架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1. 心智地图与文献阅读
2. 个人选择依赖于公共选择
3. 知识的产权界定

三、核心议题：正义

1. 艾智仁：稀缺、竞争与产权
2. 自由是整体之事
3. 正义：制度优劣的首要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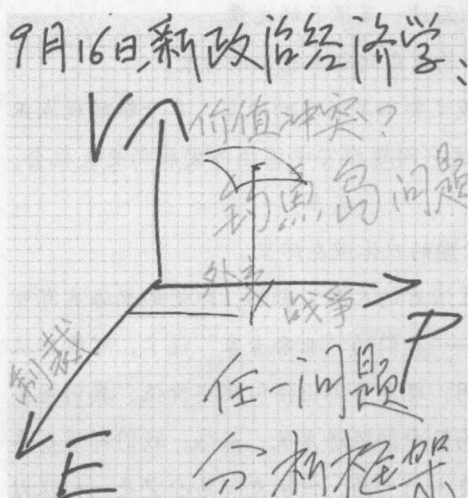
附录 逝者：艾智仁

一、政治社会学三维理解框架

现在开始上课。你们是研究生，在学习任一学科的时候，首先关注的应当是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是的，我说过，基本问题永远讨论不清楚，但若放弃讨论基本问题，你可以成为学术工匠，却永远不可能成为出色的学者。所以，权衡之后，我决定还是从讨论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开始这学期的课程。

不过，最近发生了“钓鱼岛问题”……（笑声）新政治经济学既然讨论“冲突”问题，当然也可以讨论钓鱼岛问题。我并不清楚钓鱼岛问题的细节，我知道今天早上似乎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各地出现了抵制日货和烧汽车的行为。

图 1.1 显示的，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解框架。韦伯的这一框架，我在其他文章



里多次使用过。图 1.1 有三个维度，其中，P 代表“政治”（Polity），E 代表“经济”（Economy），V 代表“价值”（Value）。

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框架里，沿着这三个维度，我们可以讨论群体行动的诸种决定因素。例如，中日钓鱼岛冲突，是经济因素重要呢，还是政治因素重要？或者，是中日双方基本价值诉求的冲突导致了这一冲突？此外，从批判性思考的角度，我们还可以询问：是否有这三个维度以外的其他重要因素？

图 1.1

其实，读书多了，你们就会发现有許多这样的三维理解框架。例如，我在 2004 年写的一套讲义^[1]里，给出康德的一个三维理解框架。我自己用来理解任一问题的框架，与康德的类似，有这样三个维度：（1）物质生活，这可以说是韦伯的经济维度的扩展；（2）社会生活，这是韦伯的政治

[1] 《制度分析基础讲义 I：自然与制度》《制度分析基础讲义 II：社会思想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维度的扩展；(3) 精神生活，这是韦伯的价值诉求维度的扩展。你可以自己构想其他的三维理解框架，但你先要想想：为什么是三个维度而不是两个维度或四个维度？

我们是“研究班”，最重要的是课堂讨论，有助于开发我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另一方式是老师讲几节课，然后研究生上台报告自己的阅读思考，这一方式不适合选课人数很多的情形。例如，今年我们有 39 名研究生选这门课，课时有限，不可能安排这么多的课堂报告，所以，只能由老师提问，你们即兴讨论。

现在，为什么几百年以来的思想者最常使用的是三维理解框架，而不是例如一维的或十九维的理解框架？在统计学里有“要素分析法”，动辄就旋转矩阵，得到很多维度，几十个维度。这是题外话，你们根据常识，请讨论。

丁丁：何江^[1]，题外话你总是最活跃，你先说说。

何江：我认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直观理解高于三维的现象。

丁丁：正确，人是有限理性动物。根据人类的经验，三维是最适合人类头脑的理解框架。

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三维框架来讨论钓鱼岛问题，发生了烧汽车的行为，还有抵制日货的行为。让我们先讨论经济的维度，例如，钓鱼岛地区有很高的潜在经济价值？可燃冰问题？何江，我知道你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

何江：如果单纯从经济利益的冲突看，我认为钓鱼岛问题不能长期持续。

丁丁：这也是我的看法，钓鱼岛问题，不是或主要不是经济的冲突。茅于軾的观点正确，钓鱼岛没有经济价值，不值得为这一问题损害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机会。我听说，有一些人把户口转到钓鱼岛了？……（笑声）

何江：岛上根本就没有人，可能有一些战争时期的尸体埋在那里。

丁丁：呵呵，也就是说，岛上有一些灵魂，让活着的人有了念想。即便那里海底有可燃冰，从而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何江——我们的“业余专家”说了，可燃冰从勘探到具体开发，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现在看不出任何现实价值。我同意茅于軾的观点，不要因为钓鱼岛冲突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我们都说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比中国对日本的更高，但毕竟贸易冲突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日资大批撤离中国，那要多少中国工人失业？

好的，让我们假设，钓鱼岛冲突的经济维度并不重要。那么，我们看看政治因素是否可以为此一冲突提供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围绕钓鱼岛冲突的政治议题是什么？在中日之间？在中日美之间？在中日美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各国之

[1] 何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计量经济研究所博士生，最近获得博士学位，应聘到东北财经大学为跨学科教育实验班学生开设两学期的计量经济学辅助课程。

间？或者根本与外交无关？何江，你还有话要说吗？

何江（举手）：我还有话说……（笑声）

丁丁：好的，现在我把话筒交给你。

何江：日本现在仍不能以正常国家的身份自立于国际，所以，它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将钓鱼岛危机延续下去。

丁丁：很好。还有谁要发言？（后排一位同学举手。）你举手了，你是从我的“行为经济学”教室过来的吗？

后排同学：日本正值大选，政客需要找到外部危机来赢得国内的选票。

丁丁：很好，也就是说，你认为，如果没有钓鱼岛问题，也会有其他问题来激发这样的对抗行为。还有谁要发言？我把话筒交给你们。（游五岳，我的行为经济学课程助教，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注册听课，她负责传递话筒。）

黄玉祥^[1]：我在宿舍里听外交学院的一位同学讲，外交通常反映一个社会的内部问题。也就是说，确立一个外部敌人往往是为了维系社会内部的团结。

丁丁：对，小骑（即黄玉祥）提供了很好的补充。哈耶克说过，人类有一种非理性的基于本能的群体行为，就是“us”（我们）对“them”（他们）的态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我们内部就可团结一致。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很古老的政治技巧。当团结出现问题时，可以向外部寻找敌人。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结尾写了这样一段精彩文字：“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2]

这两位同学都指出这一理由，即中日外患反映的其实是中日内忧。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中国现在仍是万邦来朝的盛唐时期，那时候，长安的军事领袖居然是朝鲜人^[3]。如果我们有唐代政治文化，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内部危机感，我们会怎样应对钓鱼岛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转入韦伯的第三维度，价值诉求的维度。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提供了从价值维度解释经济变迁的范例分析。我们

[1] 黄玉祥，云南大学本科毕业，在北京大学旁听我的课程并准备报考我的研究生。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83页。

[3] 指唐代名将高仙芝，高句丽族，公元755年以后担任右羽林大将军。

是否可以在这一维度找到令人信服地解释钓鱼岛危机的因素？

外交部发言人说，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然后说日本政府的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里所说的人民情感，其实是一种价值诉求，与国土的完整性密切相关的身份认同（identity）或文化认同感。如果我们不在乎天下哪一位将军入主长安，那么，我们很可能不在乎谁在钓鱼岛干了什么。汉唐盛世，我们没有“国家”观念，只有“天下”观念。我不很清楚现代身份认同有多么重要。如果中日各自身份认同都特别重要，那么，钓鱼岛问题很可能引发严重冲突。如果仅仅是身份认同感，那么，我们也可以借助南海问题满足我们的认同感。我们为何不到南海与菲律宾发生同样的冲突呢？或者，菲律宾人民并不在乎他们自己的认同问题？总之，我不很清楚，我很想知道你们的见解。

何江：日本自明治维新已形成现代国家，只不过，现在它经济日益衰退，这种民族情感也迫切需要某些外部事件来验证。但也在此时，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普遍觉悟，从而对日本的扩张有激烈反抗。

丁丁：那也就是说，价值诉求的冲突，你认为体现为中日两国现代国家意识的冲突？

何江：是的。

丁丁：我需要再想想，你可能没有说服我，至少在价值维度上。其实，中国一直有大国心态，对安南等弱小邻邦，为何没有钓鱼岛问题？加藤嘉一到哪里去了？我反而很想听听他的发言。

周末^[1]：我觉得，那些烧汽车的人多是在社会底层挣扎而且找不到出路的弱势人群，没有什么“存在感”，于是借着对外关系危机宣泄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情绪。

丁丁：你的意思是，存在感，对他们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诉求？

周末：是的，因为平常烧汽车是违反宪法的，只有在这时，他们才通过违法来获得存在感的满足。

丁丁：嗯，通过宣泄来满足存在感，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

一位女生：我听说外地给打砸抢分子带路的人常常就是当地公安人员，他们穿着便装。

丁丁：你的意思是说，地方政府为了转移弱势群体和公众舆论对政府贪腐无能的注意力？

这位女生：所以我认为现在分析钓鱼岛事件为时过早，我们应等到开下一届大会再回顾现在发生的事件……（笑声）我了解的情况是，日本年轻人其实不关心政治，这件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媒体和官员在国内的炒作。

丁丁：是，对此我也有所耳闻。呵呵，有许多同学举手，能否由你们自己传递话筒，

[1] 周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生，随周其仁教授做过社会调查，并担任周其仁课程助教。